

尼克松访华日记再现“破冰之旅”



图为1972年尼克松与毛泽东在北京的历史性会面。

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乘飞机降落北京，飞行时长不过十几个小时，但为了这次旅程尼克松却用了22年的时间。尼克松访华的一周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此后中美逐渐打破坚冰，建立彼此尊重的外交关系，由此启发了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体系的更新，推动了世界和平与经济流通，堪称20世纪政治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今年5月，《尼克松回忆录》中文版由天地出版社出版上市，这是理查德·尼克松唯一的亲笔回忆录，书中曝光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他的笔记、口授日记记录等，其中“尼克松访华日记”披露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

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1972年2月17日10点35分，我们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当飞机加速、离开地面时，我想到马尔罗讲的话。我们正在开始一次在哲学上争取有所发现的旅程，这个旅程正像很早以前在地理上发现新大陆的航行一样不可预卜，并且在某些方面一样危险。

日记

像亨利（基辛格）在飞机上所指出的，我们从全国各地收到的祝愿，我们成功的电报几乎使我们产生一种宗教的感觉。我对亨利说，我感到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人民拼命地，几乎是天真地争取和平，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亨利认为，对于这次大胆的行动以及访问一个为许多美国人所不熟悉的国土这

一事件，还有某种兴奋的成分。

我们的飞机平稳着陆。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一边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我被介绍给所有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的左边，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在共产党中国首都的刮风的跑道上，《星条旗歌》在我听来从来没有这么激动人心。

周和我同乘一辆挂着帘子的轿车进城。在我们离开机场时，他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

中国人念念不忘自我批评

下榻后，我正准备洗个淋浴，基辛格闯了进来报告说毛主席要会见我。那天深夜，我写下了会见时的气氛。

日记

在我们动身前，罗杰斯走上飞机，他很关心地说，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顶端。

我们在这方面的顾虑大约在两点钟就完全打消了，这时亨利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告诉我，周在楼下，说主席现在就想在他的住所见我。亨利下楼去了，我等了大约五分钟，然后我们乘车去毛泽东的住所。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椅子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

显然，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断吸引亨利参加谈话。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10分钟或15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头拥进会场。我们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的长沙发上。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此先寒暄了一会。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

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也不骄傲自负。他们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周不断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我就不禁想到赫鲁晓夫怎样说大话，和他相比，中国人的态度要健康得多。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态度，他们有意作出决定要保持谦虚，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

必须搞好同中国的关系

我们在北京逗留的第三个晚上，我们被邀请去观看一场体操和乒乓球表演。

日记

体操表演丰富多彩，蔚为壮观，自始至终贯彻了一种巨大的献身精神和专一的目的性。他们搬出体育器械的方式和高举红旗的入场式显示了惊人的力量。男女运动员的外表，当然还有那精彩的乒乓球表演。

亨利的警告无比正确，随着岁月的推移，不仅我们而且各国人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国人民的巨大能力、干劲和纪律性相匹配。

那天晚上我上床以后久久不能入睡。到早上5点钟，我起来洗了一个热水澡。我回到床上后，点燃了一支主人体贴地提供的中国制“长城牌”雪茄烟。我坐在床上一面吸烟，一面记下这一星期里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日记

周恩来和我在驱车前往北京机场途中作过一次很有意思的交谈。他提到毛在阔别32年之后重返故乡时填的一首词。他再次提到他常常谈到的一点：逆境是个好老师。我联想到一般的逆境，指出在选举中失败比打仗受伤还要痛苦。后者伤的是身体，前者伤的是精神。另一方面，在选举中失败可以助长力量和砥砺品格，这对迎接将来的战斗是必要的。我对周说，我发现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从胜利中学到的还多，我唯一的希望是一生中胜利的次数比失败的次数多一次。

我还举了戴高乐的例子，他在野的那几年是有助于锻炼他的性格的一个因素。他重返政坛以后认为毕生一帆风顺的人不会有坚强的性格。

周说，我在上次祝酒词中讲到我们不可能在一星期之内搭起跨越1.6万英里和22年的桥梁，说我的这种想法就像毛主席的一样，富有诗意。

回顾在中国度过的那一个星期，我感到最鲜明的印象有两个。其一是在北京观看体育表演时，观众既守纪律又激动得近乎狂热的令人生畏的景象，它证实了我的这一信念，即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它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这次访问给我留下的另一个鲜明印象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世界上的许多领导人和政治家往往全神贯注于某一事业或问题，周恩来却不然，他能广泛地谈论人物和历史。他的观点为他那种意识形态的框框所影响，然而他知识的渊博是惊人的。我很惋惜，等到我1976年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周恩来已逝于世，不能再见面了。

(王潭)

(环球)

WWF熊猫会徽原型命运多舛



别判断，它们在苏联生活了半年后，因怀疑都是雄性，赝赝被送回。另一只熊猫安安作为平平的配偶送到苏联。然而，后来人们才发现安安并非雌性，赝赝才是。赝赝被送回北京动物园后，改名为姬姬。就这样，青梅竹马的姬姬与平平被拆散了，没几年平平就去世了。

姬姬从苏联回国后，差一点又去了美国。1958年年初，芝加哥动物协会找到奥地利动物商人海尼·德默，想从中国得到一只大熊猫，为此他们愿意以高价购买。德默将从肯尼亚带来的3只长颈鹿、2头犀牛、2头河马、2匹斑马送给北京动物园，北京动物园将一只大熊猫作为回赠，最后姬姬被选中了。

然而，尽管芝加哥动物协会已经与德默谈好了价钱，但因为姬姬的“共产主义背景”，美国禁止姬姬入境。遭遇挫败的德默，又找到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希望他从中斡旋，说服美国政府网开一面。但艾伦·杜勒斯的哥哥时任国务卿，对中国持强硬立场，对此一口回绝。美国民众和媒体对此非常不满。

无法入境美国，德默只好带着姬姬展开了欧洲之旅，姬姬先后在苏联莫斯科动物园、德国法兰克福动物园、丹麦哥本哈根动物园停留。作为二战后第一只到达欧洲大陆的大熊猫，姬姬每到一处，都受到了极大欢迎。1958年9月26日，德默带着姬姬来到伦敦。因为经费有限，最初伦敦

动物园只打算让姬姬停留3个星期，但后来因为有了社会捐助，伦敦动物园以1.2万英镑买下了姬姬。

姬姬是伦敦动物园的大明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只有一点让伦敦动物园束手无策，那就是姬姬发情了，脾气十分暴躁。经过辗转，他们找到了苏联。1966年，首先是英国方面向莫斯科动物园提出建议，希望让姬姬跟当初替代它的安安这两只成年异性熊猫“交流一下感情”，苏联政府经过研究同意了英方建议。

一时间，大熊猫安安和姬姬的亲事，成了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消息常常登上报纸头版。1966年3月，姬姬乘飞机前往莫斯科，机身上印着“熊猫专机”，当飞机到达莫斯科机场时，这里已经有200多人在等待。有位记者写道：“我曾经去过世界上的很多机场，但从没有任何一位元首或国王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但是这次“相亲”很不成功，两位熊猫见面后互无好感，甚至还一言不合大打出手。1968年8月，安安又从莫斯科前往伦敦动物园与姬姬试亲，这一次相处了9个月，还是无法产生爱的火花，一场跨国婚姻终于以失败告终。

1972年，姬姬病逝，受到了公开哀悼，它被制作成标本存放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世界自然基金会主席斯科特曾一睹姬姬“芳容”，他按照姬姬形象设计的熊猫图案作为世界自然基金会会徽，传遍全世界传遍全世界。

近日中国大熊猫“如意”和“丁丁”抵达莫斯科，开启为期15年的中俄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项目，这是时隔62年中国大熊猫再度赴俄。1957年5月，一对来自四川的大熊猫被送到莫斯科动物园，其中一只名叫“姬姬”的大熊猫闻名四海，还成为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会徽原型。

1955年，四川宝新县发现了3只大熊猫，它们被送到了北京动物园。1957年，苏联领导人参观北京动物园时，被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吸引了。因为正值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于是这两只——平平与赝赝作为国礼送给了苏联。因为那时的科研水平无法对幼体大熊猫进行准确的性